

中日文學中的愛與死

——以殉情作品為探討論主題

徐翔生

1. 前言

愛與死，是人生之重要課題，亦為世界各國文學作品之永恆主題。中國歷代文學名著中，對愛與死即有諸多描寫，日本文學作品亦然。然與日本文學對照之下，中國文學雖然是以愛與死為主題，對男女之愛與生死離別悲歡之情有著深入描述，但男女共同赴死之殉情作品卻頗為罕見，對於死及死後之場景大多亦無具體呈現。相較之下，日本文學則將愛與死深刻聯結，描寫殉情之作品不勝枚舉，並對死亡有著高度憧憬，甚至呈現出一種死亡美學，與中國文學對死之概念迥然不同。究竟中國人是如何思考愛與死，日本人又是如何詮釋愛與死亡？本論文以中日文學中之殉情作品《孔雀東南飛》及《曾根崎心中》為例，探討其中所呈現之愛與死，說明中日兩國對愛與死亡之認知，檢証二國對愛與死亡之認知差距。

在此須贅言的是，描寫焦仲卿夫婦殉情之《孔雀東南飛》，發生於三世紀的漢末建安年間，《曾根崎心中》則發生於十八世紀的日本近世，二者不僅國別不同且時代相距甚遠，進行比較研究似有疑議。但中國歷代文學中，描寫殉情之作品甚少，僅見於《孔雀東南飛》與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二著。然與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對照之下，《孔雀東南飛》在文學史上地位更高，歷來研究者與相關研究甚多，可謂中國殉情作品的代表之作。而《曾根崎心中》則是近松門左衛門撰寫的首部殉情作品，作者對殉情的看法完全蘊涵於此作之中，又因該作在舞台上表演之轟動造成社會上殉情之流行，因而也是日本研究殉情之首選作品。拙論期藉以上二作之對照比較，自宗教學及比較思想之觀點，試論中日兩族對愛與死概念之差異，並探究其思想差異形成之緣由。期藉拙論，釐清中日兩國對愛與死之觀念，闡明二國於死生觀之差異，並期藉此研究，對中日文化思想之比較研究能有所助益。

2. 中日殉情文學——《孔雀東南飛》與《曾根崎心中》

中國文學名著中，以愛與死為主題之作品甚多，但以殉情為主題之作品並不多見。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田中謙二曾經指出，中國文學中有關殉情之描寫，

僅出現於收錄在徐陵所編《玉臺新詠》中之《孔雀東南飛》，此乃中國文學中僅有之殉情作品¹。據田中謙二之解說，中國人極具現實主義精神而不太相信死後世界，殉情因而在中國極為稀有²。以下就以《孔雀東南飛》為焦點，說明中國文學是如何描述殉情，探討中國人對愛與死之理解。

《孔雀東南飛》原題為《為焦仲卿妻作》，後人因其首句「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」³，而亦稱為《孔雀東南飛》。這部作品的創作時間有諸多說法，依其序言「漢末建安中」⁴所示，本事發生於東漢末期之建安年間，但作品係於五世紀的南朝前期或六世紀之梁末完成⁵，其主要內容是描寫焦仲卿夫婦之殉情。

焦仲卿是東漢末建安年間廬江郡之小吏，與女子劉蘭芝成婚。劉蘭芝「十三能織素，十四學裁衣。十五彈箏篴，十六誦詩書。十七為君婦」⁶，可謂詩書禮樂均通，是極具良好教養之女性。然劉蘭芝嫁入焦家後不為焦母喜愛，常因「舉動自專由」⁷而得咎。在焦母逼迫仲卿與蘭芝離緣之時，其夫僅能恪遵孝道而遣歸之。

劉蘭芝歸寧本家後即有縣令遣媒提親，其後又有太守遣臣說媒。蘭芝之兄議她再嫁，但她表示仲卿必將迎返而無意再婚。其兄不耐故以「足以榮汝身」⁸為由，質責為何不願再嫁。蘭芝自慚歸寧返家而無力違抗兄長意志，終於答以「謝家事夫婿，中道還兄門。處分適兄意，那得自任專」⁹，而應允再嫁。

劉蘭芝許婚後焦仲卿匆忙趕來，對其表示「卿當日勝貴，吾獨向黃泉」¹⁰，告知自己將以死明志。蘭芝聞之也隨即回答「黃泉下相見，勿違今日言」¹¹，表明自己亦有尋死之意，並與其相約共同赴死。其後劉蘭芝於親迎之日投水自盡，焦仲卿聞之亦於其後「徘徊庭樹下，自掛東南枝」¹²，於家中庭院東南方的樹枝上吊自盡。

這個意外發展，讓兩家尊長決定將二人合葬。其後在墳上「東西植松柏，左右種梧桐。枝枝相覆蓋，葉葉相交通。中有雙飛鳥，自名為鴛鴦，仰頭相向鳴，夜夜達五更」¹³。聽到此聲的人都會為之駐足，有揪心之痛。作者亦於卷尾寫著「多謝後世人，戒之慎勿忘」¹⁴，告知後人應以此為戒。

以上是中國文學對殉情之描寫，至於日本文學又是如何描述殉情呢？《曾根

¹ 田中謙二《樂府·散曲》(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83年1月)74頁。

² 同注1，74頁。

³ 吳兆宜注·程琰刪補《玉臺新詠箋注》(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88年7月)43頁。

⁴ 同注3，43頁。

⁵ 雷家驥《孔雀東南飛箋証》(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08年6月)4頁。

⁶ 同注3，43頁。

⁷ 同注3，44頁。

⁸ 同注3，49頁。

⁹ 同注3，49頁。

¹⁰ 同注3，52頁。

¹¹ 同注3，52頁。

¹² 同注3，53頁。

¹³ 同注3，53頁。

¹⁴ 同注3，54頁。

崎心中》堪稱日本殉情作品之經典代表作。一七〇三年，近松門左衛門將當時發生的殉情撰寫為《曾根崎心中》，此作搬上歌舞伎與淨瑠璃舞台之後，殉情者人數激增甚至謂為流行。因此日本殉情流行之根源，被認為是來自《曾根崎心中》，江戶時代殉情之流行，被視為與近松門左衛門之文筆相關¹⁵。以下聚焦《曾根崎心中》，藉由其中所見之殉情思想，探討日本人對愛與死之理解。

《曾根崎心中》描寫平野屋店員德兵衛與遊女阿初之殉情。德兵衛的主人亦為其伯父，以二貫錢訂金為他訂下婚約。但德兵衛堅持與阿初之戀情，向主人表示「我豈會接受銀兩一生看妻子臉色」¹⁶，而未答應婚約。此舉因而激怒主人，除向德兵衛追討婚約訂金，並將其驅逐出大阪。

然德兵衛欲歸還主人的訂金，卻不幸被友人九平次騙走。乃因德兵衛因被九平次苦苦哀求，故將打算歸還主人的錢先借給他。但在其後，九平次不僅表示未曾借錢，甚至進而指責德兵衛是以偽造借據欺騙，並於眾人之前對其拳打腳踢加以羞辱。德兵衛因在眾人面前受辱而顏面盡失，再加上無法歸還主人訂金而不能立足，因此進而出現尋死意念。阿初則向德兵衛表示「二人相會並非只限於此世」¹⁷、「可以死來雪恥」¹⁸，並且表明自己願意與其一起赴死。於是德兵衛與阿初相約，二人前往曾根崎天神的森林殉情。

德兵衛與阿初以「彼此相視愉悅至極赴死」¹⁹之心情，一起前往曾根崎天神森林。二人一邊感傷祈禱著「死後定能像夫妻般永不分離」²⁰，一邊祈求著「現世之願能於來世完成，二人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²¹，而終於來到了赴死現場。於是二人選擇了棕櫚相生的連理樹為殉情場所，希望死後能夠成為世間殉情之典範。其後德兵衛先用刀刺死阿初，再以剃刀切斷自己咽喉，在「南無阿彌陀佛」²²的念佛聲中，經歷了「瀕死前的四苦八苦」²³，二人終於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²⁴，實現了彼此之愛情。

3. 殉情文學中的愛與死

以上是《孔雀東南飛》與《曾根崎心中》之簡述。上述二殉情作品，男女主角皆因在現世無法完成戀情，故將戀情寄託於死後世界，期盼彼此之愛情能於死

¹⁵ 參照村松剛《死の日本文学史》(東京：新潮社，1975年5月，220—221頁)、諏訪春雄《心中—その詩と真実》(東京：毎日新聞社，1977年3月，223—230頁)。

¹⁶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曾根崎心中》(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93年9月)111頁。

¹⁷ 同注16，112—113頁。

¹⁸ 同注16，121頁。

¹⁹ 同注16，124頁。

²⁰ 同注16，124頁。

²¹ 同注16，126頁。

²² 同注16，129頁。

²³ 同注16，129頁。

²⁴ 同注16，130頁。

後實現，因而共同選擇赴死。自此即可觀知，殉情是為實現愛情而赴死，是為完成戀情而自行結束生命。

但自前節所述亦可觀知，以上殉情作品之主題，雖在敘述男女主角為愛而赴死，但作品內容並非僅在傳述其為愛赴死之苦難遭遇，其中亦包含著家庭倫理、社會意識以及時代世局等諸多因素，可謂是愛情婚姻與家庭倫理、社會意識等矛盾衝突之悲劇。以《孔雀東南飛》為例，其主旨究竟是在強調自由與愛情，抑是訴求傳統社會之禮教，甚或僅是簡單的婆媳衝突與家庭矛盾，至今仍眾說紛紜而無定論²⁵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亦然。該作主旨究竟是在根究愛情與自由的價值觀，或是欲藉尋死雪恥，抑或僅是對其不平之境遇表示抗議，在日本學界亦有諸多解說而意見分歧²⁶。

事實上，文學作品可謂時代之借鏡，作品中的內容不僅可反映出世相，更可窺視當時之思潮。以上殉情作品究竟反映出何種世相思潮？在此先自《孔雀東南飛》論述。

誠如前節所述，《孔雀東南飛》中，劉蘭芝因受焦母所迫而歸寧。自西方個人主義、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，劉蘭芝可謂是反封建、爭自由的思想前衛人士；自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，更可謂是反傳統及追求愛情之堅勇女性。因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，對男女間之愛情有諸多限制，《禮記》中記載「男女無媒不交，無幣不相見」（「坊記」）²⁷、「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」（「坊記」）²⁸，說明男女必須遵從父母之命或媒酌之言成婚，無法自行追求愛情與主導婚姻。男女間的自由戀愛，因為帶有突破禮教追求自由之意涵，甚至可能會違反家族制度與社會秩序，故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受到諸多限制與束縛。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傳統社會，更因各種禮法顧忌而致文學作品大多不敢多言男女關係，即使是夫婦間之男女關係，也因各種禮教限制而極少涉及閨房燕妮之情。

中國的傳統社會，不僅基於禮教對男女之愛情有所限制，在傳統的家父長家族制度下，必須遵從家中權威者之命令，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下，姐妹亦須服從兄長之命。這種下敬上的思想，因與儒家倫理中的「孝悌」思想一致，故在傳統社會封建家庭中被嚴格要求。《孔雀東南飛》中，焦仲卿在面對其母逼迫離緣之時，只得請其妻先暫歸寧，而不敢為婚姻自主向其母抗爭。而劉蘭芝在面對兄長逼迫再嫁之時，亦謂「處分適兄意，那得自任專」，也不敢與其兄長抗爭。自此亦可觀知，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與家庭結構下，男女主角必須服從家中權威者之意見，而無法為其愛情與婚姻自主抗爭，此乃男女主角選擇相殉以明愛之主要原因。

據上所述，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封建家庭，男女主角的愛情因為遭受家中權威者之阻隔，其婚姻亦無法獨立自主，二人因而選擇死亡，將現世無法實現的愛情

²⁵ 參照雷家驥《孔雀東南飛箋註》（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08年6月，1—2頁）。

²⁶ 參照廣末保《增補近松序說》（東京：未來社，1970年8月，89—92頁）、重友毅《近世文學史の諸問題》（東京：明治書院，1963年12月，147—148頁）。

²⁷ 孫希旦撰《禮記集解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66年10月）1184頁。

²⁸ 同注27，1184頁。

寄於死後實現。而此悲劇之發生，實與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風尚、社會文化、以及家庭結構有關，甚至亦與孝、悌等儒家倫理道德有所關連。若自此觀點思考，《孔雀東南飛》可謂中國傳統社會之禮教束縛及封建家庭結構下，男女愛情因為受到干涉與破壞，因而以死來捍衛愛情所發生之悲劇。

事實上，與此類似的社會文化因素，並非僅存於中國之殉情作品，在日本的殉情作品中亦可窺視。前節中提及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男女主角因在現世無法完成戀情，因而選擇為愛相殉。但此作中其實包含著甚多日本近世獨特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因素，男女主角也是因此而步上死亡之途。

前節中曾提及，德兵衛因拒絕主人婚約而引起悲劇之發生，因被友人陷害顏面盡失而有了死亡覺悟，德兵衛因此希望藉由與阿初的殉情，在成就二人無法完成戀情之同時，亦能表示清白並挽回其所喪失之顏面。但若再深入思考，即使德兵衛未拒絕主人之婚約，友人亦未以奸計陷害，只要他堅持與阿初的戀情，即已步上死亡之路成為悲劇之命運。

因為在日本近世的商業社會，商人的顏面與信用極為重要，如果顏面信用一旦受損，商人不但無法在社會立足，甚至還可能會失去生存空間，對生活或生命造成威脅。因為當時的商業組織，所有生意上的往來都是基於個人與商家的信用成立，如果發生過失失去信用，即會被商業組織或同業排除，也會因此而失去了生存空間。所以對於商人而言，顏面信用是極重要之事，商人因此也會盡力來予以維護²⁹。

從今日的觀點來看，即使顏面喪失或被主家放逐，只要存活於世，所有困難應該都能迎刃而解，男女主角或許不需走上死亡之路。但在當時保守的商業社會，商人組織間之連結極為密切，只要是主家驅逐的店員，其他商家組織也會拒絕雇用³⁰。因此對德兵衛而言，在眾人之前受辱而顏面喪失，其信用即已嚴重受損，也意味著自己將無法在世間立足，意即表示其已失去了生存空間，這也是促使男女主角做出赴死抉擇的原因之一。

《曾根崎心中》中所見之殉情，不僅與日本近世封閉保守的商業社會有關，更與男女主角之身分及經濟狀況有著密接關係。因為這部作品中的主角，是一醬油店中身分頗低的店員，可是卻與遊女相愛，甚至希望與其貫徹戀情。若要與遊女相愛，必須花費相當金錢，然德兵衛不僅無法為其贖身，甚至還無力歸還主人之婚約訂金，是一經濟相當拮据的人。經濟拮据的人若要與遊女相愛，確實是有其困難之處。《心中大鑑》是撰寫殉情之史書，據該書的記載，當時發生的殉情大多是因經濟因素而起，即男女在經濟狀況困難愛情無法持續之時，雙雙共同選擇赴死，此乃殉情發生之主因³¹。因此窮困的德兵衛若要堅持與阿初之戀情，即表示其已步上了尋死之路。

據上所述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中所見之殉情，可謂男女主角為追求自由與愛情，

²⁹ 參照宮本又次《近世商人意識の研究》(東京：有斐閣，1941年12月，79-81頁)。

³⁰ 參照宮本又次《近世商人意識の研究》(東京：有斐閣，1941年12月，81-82頁)、滝川政次郎《日本社会史》(東京：刀江書院，1938年4月，112-113頁)。

³¹ 參照《心中大鑑》(《近世文芸叢書》所收，東京：国書刊行會、1970年7月，210頁)。

對當時社會表示的一種抗議，亦為對自己遭受的不平境遇表示之抗議，其背後還蘊涵著當時的社會文化，甚至也包含著複雜的經濟因素。若自此觀點思考，日本文學中的殉情作品，實為詠嘆近世保守的商業組織及社會結構下，個人為追求自由愛情而與社會環境發生之衝突，因而選擇相殉以明愛。如果基於這個觀點思考，中日兩國的殉情作品，均有男女為追求愛情與婚姻自主，而欲突破社會文化與封建禮教之意涵，二者確實是有相近之處。

4. 殉情文學中的宗教意識

在此值得注意的是，以上二著有關殉情結果之描述。如前所述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男女主角因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而相殉，作者並給二人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之美好殉情結果。相對的是《孔雀東南飛》中，男女主角為在「黃泉下相見」、「黃泉共為友」而相約赴死，作者並將殉情結果描寫為「枝枝相覆蓋，葉葉相交通」的「連理枝」、以及「中有雙飛鳥，自名為鴛鴦」。「連理枝」與「鴛鴦」之寓意為何？這種殉情結果究竟又代表著何種意涵？

據日本宗教學者竹田晃之解說，這是焦仲卿夫婦「強大的愛情力量在死後產生了奇蹟，其魂魄於冥界中結合，因而出現如此殉情結果」³²。即男女主角的愛情感動了天地，由於神明受到感動，因而在其死後出現「連理枝」「鴛鴦」之奇蹟³³。然「連理枝」「鴛鴦」之殉情結果，是否真正僅是一種奇蹟？

根據雷家驥之解說，《論語》中記載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」（「子罕第九」）³⁴，以松柏比喻君子之節操，以歲寒比喻逆境，說明君子的節操唯有遭逢逆境才能分外顯現。《孔雀東南飛》中記載種植於焦仲卿夫婦墳上的松柏與梧桐「枝枝相覆蓋，葉葉相交通」，乃是比喻其生機盎然、結成連理，而無異心。或許這是時人對焦仲卿夫婦生前不能偕老，故於死後以此象徵其復結連理，以求自我的心理平衡及補償。或許這也是作者相信世間有靈異現象，故以連理枝及鴛鴦之比喻轉化手法，誇張作品之文學效果³⁵。

誠如雷家驥所指，作者將男女主角死後描寫為連理枝與鴛鴦，確實是有比喻轉化之意涵，使此悲劇作品能以圓滿終結。因為在中文中，連理枝比喻男女愛情堅深，鴛鴦則象徵夫妻恩愛且形影不離。《孔雀東南飛》的作者將殉情結果描寫為「連理枝」，並且塑造為「鴛鴦」之形象來看，男女主角應於死後在「黃泉下相見」且「黃泉共為友」，成為「連理枝」或「鴛鴦」般的恩愛夫妻，永遠相愛獲得了生前無法成就之愛情。但同樣是描寫殉情，為何《曾根崎心中》會出現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之光明美好結果，《孔雀東南飛》卻以這種隱喻、

³² 竹田晃《中国の幽霊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，1980年12月）89頁。

³³ 同注32，9—90頁。

³⁴ 楊伯峻譯注《論語譯注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，1992年9月）209頁。

³⁵ 雷家驥《孔雀東南飛箋証》（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08年6月）194—196頁。

暗示性之救贖表示？這種差異出現之緣由為何？在此先自《孔雀東南飛》論述。

為何中日文學的殉情作品會有如此差異，此與中國傳統之文化思想有關，亦與中日兩國對死亡的思考差異有所關連。眾所周知，中國自古以來有其傳統之宗教，並有對死亡之獨特思考。在中國，儒家思想為倫理道德，支配著統治階級與知識份子的精神生活，道家思想的處世哲學，影響著一般民衆的日常生活與思維模式。至於由道家發展而來的道教，則是做為民間信仰於庶民社會極受歡迎。儒道思想與道教，是中國固有的思想宗教，自古以來即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死亡觀念。

然不論儒家或道教，二者皆只重視現世之「生」，而避談死亡且諱言死亡。誠如《論語》所述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(〈先進第十一〉)³⁶、「不語怪力亂神」(〈述而第七〉)³⁷，儒家重視的是現實的生，對於死亡表現著回避而不論之態度。自《老子》所述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(〈第二十五章〉)³⁸亦可觀知，道家對生死採取的是「自然」態度，認為此乃世間之自然法則，希望藉此超越人類之生死。而深受道家影響之道教，則是致力於延長生命或延緩避免死亡，因而發展出中國自古以來所流傳的長生不老不死之樂天思想。

如上所述，中國傳統的儒道二教，均只重視現實人生，有極度現世主義及現實主義之傾向。即使佛教傳入中國後，讓中國人理解到「三世」概念，擴大了對死後世界之視野，豐富了中國人固有的死亡意識；但因受到傳統文化思想影響，還是難以改變中國人自古以來所流傳的死亡觀念。事實上，佛教在紀元前後的漢代已傳入中國，三、四世紀的魏晉以後，佛教已走上獨立發展之路，撰寫《孔雀東南飛》的五、六世紀，佛教更已在中國相當普及盛行。然自此作亦可觀知，男女主角是為在「黃泉下相見」而相約赴死，是因於「黃泉共為友」而決定殉情。可見古代中國人的死亡意識，依然深受傳統文化的「黃泉」觀念影響，尚未出現天國與地獄之概念。

中國人傳統的思想中，對於死後世界雖有黃泉之概念，但對天國卻毫無認知。再加上受到儒道二教現實主義及現世主義影響，因此較難出現天國或西方淨土之概念，這種世界觀自古以來即深植於中國社會，故將現世視為穢土、來世視為極樂世界的佛教思想，也較難以在中國人心裡扎根。因此中國的文學中，只有關於地獄之描寫，有關極樂世界的天國描述，可謂微乎其微。或許正因受此世界觀影響，所以中國的殉情作品，自然無法看到死後於極樂世界有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之美好結果，對於殉情的結果，也僅能以「連理枝」、「鴛鴦」等暗示性之表現為救贖。

中國的殉情作品中，可以看到男女愛情受儒家禮教之約束，亦可窺視中國人的死亡意識及死亡態度，受到儒道二教之深刻影響。相對之下，日本殉情作品中則可看到較多佛教之世界觀，男女之戀情亦常與佛教思想連結。誠如日本國文學

³⁶ 楊伯峻譯注《論語譯注》(台北：五南圖書，1992年9月)247頁。

³⁷ 同注36，158頁。

³⁸ 朱謙之《老子校釋》(台北：漢京文化，1985年10月)103頁。

者村松剛及宗教學者石田瑞磨所指，以《曾根崎心中》為首，所有殉情作品均是基於佛教思想撰寫，殉情是以佛教信仰為支柱³⁹。例如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男女主角因為心中懷有「現世之願能於來世完成，二人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之念，因而一起共同赴死。這種思想的背後，蘊涵著佛教的世界觀，佛教訴求的來世主義、欣求淨土思想以及一蓮托生之念，均可在此洞悉。但若再深入思考，這種來世觀與淨土思想，是否真正與佛教思想一致？

眾所周知，佛教認為人生在世即為痛苦，芸芸眾生必須接受各種痛苦，以苦來認知人類之生存。佛教認為人以生老病死的四苦為首，再加上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陰盛苦，讓人終身受此八苦所惱，生活於此充滿痛苦煩惱之世間。人類生存於此現世，不僅需要忍受上述四苦八苦，更為各種慾望及無知所惱。因此人們必須斷絕慾望，自覺生存之苦乃是來自各種慾望無知，如此方可自痛苦煩惱中解脫，真正獲得救贖。

如上所述，佛教在教義上否定男女之戀，並不認同男女間之愛情。在佛教中，男女的「愛情」是一種執著、也是一種慾望，是使人們痛苦煩惱之原因，也是使人於生死世界中輪迴之理由。所以人們一定要放棄慾望，斷絕所有的執著愛慾，依靠正確的修行之道，如此才可自痛苦煩惱中完全解放，進入真正進行宗教修行之涅槃境界。

但在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強調著男女之戀情，並將男女的愛情與佛教思想相連結，甚至肯定及美化了死亡。如同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所示，男女主角因為持有共同往生淨土之想法，因而決定一起赴死。這種共赴淨土、欣求淨土之想法，看似與宗教思想並無矛盾；但若自佛教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思考，持有執著愛慾的人，死後是否真正能夠往生極樂淨土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，甚值得質疑。這種結果的表現，只能說是作者對以尋死做為現世困境解脫之道的肯定，亦可視為日本人對死亡美化的一種表現。

《曾根崎心中》所見之殉情，不僅與佛教的人生觀及世界觀有所矛盾，其中所見之一蓮托生與往生淨土思想，亦與佛教淨土信仰相異。誠如日本倫理學者相良亨所指，一蓮托生思想起源於日本中世末期的說經集《かるやか》，是日本獨特之淨土信仰⁴⁰。這部作品中記載，家人團圓一起進行佛教之修行，死後即可往生極樂淨土，全家共於一座蓮花之上修行⁴¹。但在佛教經典中，並無一蓮托生之詞，這種思想也未曾出現於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，是來自日本獨特之淨土信仰。據相良亨之解說，日本因為存有一蓮托生思想，這種想法強烈影響著日本人之死生觀，因此才會出現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的殉情思想⁴²。

³⁹ 村松剛《死の日本文学史》(東京:新潮社, 1975年5月, 228頁)、石田瑞磨《日本古典文学と仏教》(東京:筑摩書房, 1985年4月, 374頁)。與此相近之解釋, 亦可見於 Maurice Pinguet 著・竹内信夫譯《自死の日本史》(東京:筑摩書房, 1986年5月, 236-238頁)。

⁴⁰ 相良亨〈日本人の死生観〉(《相良亨著作集4》)所收, 東京:ぺりかん社, 1994年4月, 92頁)。

⁴¹ 室木弥太郎校注《かるやか》(新潮日本古典集成《説經集》)所收, 東京:新潮社, 1977年1月)77頁)。

⁴² 相良亨〈日本人の死生観〉(《相良亨著作集4》)所收, 東京:ぺりかん社, 1994年4月, 93

殉情思想的背後，不僅蘊涵著日本佛教獨特的一蓮托生思想，亦與佛教之淨土信仰有所矛盾。根據淨土教之觀點，在此充滿痛苦煩惱之污穢現世，凡夫俗子的人們因為無法修行，故僅能於死後之極樂淨土聽誦佛法修行，如此方能進入宗教修行的涅槃境界。誠如日本思想學者高島元洋所述，執著於現實之意識，與欣慕極樂淨土之他界，乃完全不同次元之事。因為欣慕極樂淨土，首先應理解現世之無常，厭離此穢土之無常現世，視來世的淨土為己應赴之處。因此若要往生淨土，首先必須消除現世之執著，在此現世中的所有執著，應被欣慕極樂淨土的他界之心否定。⁴³

但在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男女主角將期待置於來世，並非是因頓悟現世之無常，也不是自覺愛慾是使其痛苦煩惱之原因，更不是因覺悟現世是穢土世界而對其厭惡否定。他們因為在此現世之戀情無法實現，故將理想希望自現世轉至來世，期盼能於來世實踐現世所無法實現之戀情。這種來世觀中，不僅未見對男女愛情之否定，亦無消除現世中之愛慾執著，更無淨土信仰中視現世為穢土之觀念，也未見對自己存在乃罪惡之意識。這種極樂往生的想法，不僅與佛教思想不符，也明白表現出與佛教淨土信仰之矛盾。

5. 結語

據上所述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中確實蘊涵著佛教之來世觀，佛教訴求的欣求淨土思想、日本淨土信仰獨特之一蓮托生思想，均可在此作品中窺視。然自以上所述亦可觀知，這部作品中出現的一蓮托生或欣求淨土思想，均非源自佛教思想，且與佛教之淨土信仰有矛盾之處。這部作品中所見之殉情，與佛教的人生觀及世界觀不同，亦與將現世視為穢土之淨土信仰有所矛盾。因此《曾根崎心中》雖是受到佛教影響，但作者僅是借用佛教的來世及轉生思想，發展出其獨特之殉情思想。

非僅如此，佛教思想中人類因生存所須面臨之四苦八苦，在這部殉情作品的描述下，成為了「瀕死前之四苦八苦」。歷經了這種瀕死之際的異常痛苦，人們才能得到「無疑未來成佛」之救贖，真正「成為戀愛典範」。而原本消除所有執著欲望，斷絕人生四苦八苦煩惱才能進入之涅槃境地，也在歷經「瀕死前之四苦八苦」後而得到了救贖。原本妨礙佛道修行之男女戀情，被視為禁欲對象之男女執著愛慾，也因這部作品之描述，使其看來合理且美好，並且因而獲得極大肯定。如上所述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中所見之殉情，與佛教思想實有極大差異。

與《曾根崎心中》對照之下，《孔雀東南飛》中未見濃厚之佛教色彩，也未見欣求淨土與一蓮托生之念。受到儒家與道教之現世主義影響，在中國的殉情作

—95 頁)。

⁴³ 高島元洋〈中世における他界觀念の一樣相〉(《日本倫理思想史研究》所收，東京：ぺりかん社，1983年7月，42-43頁)。

品中，難以看到有關來世之記述，也無法看到對於死後有高度期待。如同「黃泉下相見」、「黃泉共為友」所示，《孔雀東南飛》中僅描述死後能於黃泉相會為友，對於殉情之救贖，僅以「連理枝」、「鴛鴦」等比喻、暗示性之方式表達。自此可以觀知中日兩族對死亡看法之差異，亦可察知中日兩國於死生觀之差異。

因為受到儒家與道教之影響，中國人總會居於現世之立場思考死亡，以現實主義之觀點來看待事物。在此現實主義及現世立場的影響下，中國人對自己無法看見之物會感質疑，會以冷靜的態度去思考所有事物。因此中國人較難以接受佛教之來世觀，亦較無法認同佛教所述之淨土思想。

因為自儒家及道教現世主義的觀點來看，極樂淨土是超越現世無法看見之處，人們無法清楚意識對其之感覺。我們因為無法看到這個不可視的世界，也無法直接經歷這個超出意識之世界，因此對中國人而言，極樂淨土可謂是所謂的虛像。這種不確定的死後世界是否真正存在，乃值得懷疑。人們死後是否真正能赴這個虛像世界，亦令中國人質疑。

綜上所述，由於受到儒家與道教的現實主義影響，再加上難以接受佛教之淨土思想，因此中國文學以殉情為主題的作品甚少，也較難發見歌詠殉情之作品。即使有《孔雀東南飛》的殉情作品，但也無法見到日本殉情作品《曾根崎心中》中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之美好結局，而僅能以「連理枝」及「鴛鴦」等暗示性、隱喻性之表現，做為對殉情之救贖。自此可以觀知中日二國對死亡之看法。即佛教滲入日本人的生活中，對日本人的死生觀產生莫大影響，受到佛教來世觀及淨土思想影響，日本人對死亡有著高度期待，並對死後世界感到憧憬，甚至有將死亡美化之傾向。

相較之下，中國人的死生觀則較不受佛教影響，而與傳統之儒道二教有所關連。或許正因受此傳統宗教影響，中國人對來世較無過多期望，亦無肯定及美化死亡之傾向。因此自以愛與死為題材撰寫的殉情作品來看，中日文學作品自然會有極大差異，對於死亡之理解亦儼然不同。此乃中日文學的殉情作品中，二者最大之差異，同時亦為中日死生觀迥然不同之處。

参考文献

- 石田瑞磨 《日本古典文学と仏教》 東京：筑摩書房 1985年4月
 相良 亨 《日本人の死生観》 東京：ぺりかん社 1984年6月
 相良 亨 《日本人の心》 東京：東京大会出版会 1984年11月
 諏訪春雄 《愛と死の伝承》 東京：角川書店 1968年12月
 高島元洋 〈中世における他界観念の一樣相〉(《日本倫理思想史研究》所收)
 東京：ぺりかん社 1983年7月

- 高島元洋 〈情による超越—他界から虚構へ〉(《超越の思想》所收) 東京：
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2月
- 高島元洋 《日本人の感情》 東京：ぺりかん社 2000年4月
- 竹田 晃 《中国の幽霊》 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0年12月
- 立川昭二 《日本人の死生観》 東京：筑摩書房 1998年6月
- 中村 元 《東洋人の思惟方法》 東京：春秋社 1972年12月
- 中村 元 《原始仏教の生活倫理》 東京：春秋社 1972年8月
- 久野 昭 《日本人の他界観》 東京：吉川弘文館 1997年2月
- 村松 剛 《死の日本文学史》 東京：中央公論社 1975年5月

